



中华思想经典

春秋繁露

【汉】董仲舒 著
周桂钊 译注

中华书局

董仲舒



中华思想经典

春秋繁露

【汉】董仲舒 著
周桂钿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繁露 / (汉) 董仲舒著; 周桂钿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

(中华思想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07665 - 3

I. 春… II. ①董…②周… III. ①儒家②春秋繁
露—译文③春秋繁露—注释 IV. B23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213158 号

书 名 春秋繁露

著 者 [汉]董仲舒

译 注 者 周桂钿

丛 书 名 中华思想经典

责任编辑 王守青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8}$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665 - 3

定 价 14.00 元

前言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天人三策》是他的思想精华。这两者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资料。

董仲舒是西汉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成为儒学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早年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在汉景帝时代任经学博士,并教授众多弟子。他专心研究时,曾经三年不去看自己的园圃。他的学生很多,都是由几个先来的学生,从董仲舒那里学习后再去教其他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董仲舒那里学习了几年,还没有见过董仲舒的面。汉武帝时期,他参加对策,连续三次,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这三次对策的策文主要讲了天人感应的问题,后人称为“天人三策”。任江都相期间曾一度任中大夫。后从江都相调任胶西相。不久,由于年老,又不得志,辞职回家,专心从事著述和教学工作。他虽然穷居陋巷,朝廷有些议而不决的事,还派御史大夫张汤等去向他咨询。董仲舒的著作由后人汇编成一书,汉代时称《董仲舒书》,后来称《春秋繁露》。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收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成果,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靠资料。另外,董仲舒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著名的有嬴公(汉昭帝时任谏议大夫)、褚大(任梁相)、吕步舒(任丞相长史)、殷忠(《汉书》作段仲)等。在当时社



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弟子约有几百人。他的子孙也都因为有学问而当了大官。董仲舒的学生及后学著名的还有陆孟、孟卿、严彭祖、颜安乐、刘向、王彦以及东汉何休等。西汉另外两个著名的公羊学大家：一个是胡毋子都，另一个是他的弟子公孙弘。公孙弘当了大官，没有从事教学工作，因此没有弟子。董仲舒以后，研究公羊学的学者大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和后学。西汉时公羊学很盛行，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实际上是董仲舒思想对于政治的影响的结果。因此，汉代思想家认为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无）以加，管、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刘向认为董仲舒是王者的助手，与商汤的助手伊尹、周武王的助手吕望差不多，管仲和晏婴只是霸者的助手，比不上董仲舒。刘向的儿子刘歆虽然不认为董仲舒超过管仲和晏婴，但也承认董仲舒在西汉时代“为群儒首”（同上），是当时儒者的首领。东汉王充是一个特立人物，轻易不盲从别人所说，一切思想都要经过自己重新思考，再作判断。他认为董仲舒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他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论衡·别通》）。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他认为董仲舒是周文王、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是圣统的继承者。用现代话说，那就是当代圣人。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些著作中反映出来。例如，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天下经学大家聚会，讨论经学中的不同意见，最后由皇帝“称制临决”，由史学家班固写成会议纪要，名曰《白虎通义》。在《白虎通义》中多次引用董仲舒的说法来论证一种观点，如说“王道之三纲，

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白虎通义·三纲》说：“三纲法天、地、人。”董仲舒在《五行对》中首先提出“五行莫贵于土”，《白虎通义·五行》也采取了这种说法。另外，董仲舒的“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未逾年之君，当称子”，还有灾异谴告说、性情阴阳说，也都被《白虎通义》所采纳。在西汉盐铁会议上，也有人引董仲舒的说法作为争论的理论依据。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也采用了董仲舒的一些说法。如对“王”的解释，就用董仲舒的说法。许慎是被称为“五经无双”的精通经学的人物，在编这种权威性的字典时，也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是有权威性的。

董仲舒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跟他的思想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有关系。哲学可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二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三是求美的艺术哲学。董仲舒的思想从总体上说，是求善的政治哲学。他的思想体系是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这个思想体系，用最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国君即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总结。周代末年，诸侯强大，不服从周天子，于是天下分裂，整个社会陷入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民不聊生。人民要过安定的生活，就需要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王权是社会秩序的代表”（恩格斯语）。只有“屈民而伸君”，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在汉景帝时代，由于吴楚七国叛乱，曾经破坏了安定的秩序，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董仲舒亲身经历了这一场灾难，总结教训，他认为必须让所有的“民”都要服从天子，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这个“民”，主要是指那些地方上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国王，因为只有这些人物才是不稳定的因素，才会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政治



“大一统”。提倡“大一统”，就是强调统一，反对分裂，防止分裂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当时有远见卓识的理论，也是针对当时分裂危险而提出的非常先进的理论。

“屈君而伸天”，这是说国君要服从上天。全民统一于皇帝，虽然防止了分裂，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倾向——极权专制。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纷争，虽然政治统一了，却由于皇帝极权专制，不受制约，也一样导致天下大乱。董仲舒从另一个方向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天人感应”“屈君而伸天”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天的权威限制皇帝权威，就是想给皇帝戴上精神枷锁。

上天是什么？天有什么意志？谁也不知道。但是，董仲舒说，天意是可以从自然现象中研究出来的。董仲舒用一套天人同类、同类感应理论来解说天意，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论，一方面把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天命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特别是皇帝的思想行为，会感动上天。上天会根据皇帝的言行，作出表态，并通过自然现象表达出来。如何表达？这是董仲舒的解释：上天用灾害（旱灾、水灾、虫灾等）和怪异（山崩、地动、母鸡报晓等异常现象）来批评、警告皇帝。皇帝如果改正错误，这些灾异就会自然消失。如果皇帝执迷不悟，那么，上天就会让皇帝身败名裂，重新选能够保护人民的人当皇帝。如果皇帝为人民做了好事，上天也会用祥瑞来表示赞赏。祥瑞包括嘉禾、灵芝、甘露、龙凤、瑞草等。简单地说就是：天下出现灾异，就是上天对皇帝的批评；天下出现祥瑞，就是上天对皇帝的表扬。皇帝是封建时代政权宝塔尖上的人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般官员给他提意见，不受重视，不起太大作用，但是，一说到天，他就不敢不认真听取。皇帝有什么错误，当官的不敢提，或者提了也没有用。有

了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等于有了向皇帝提意见的精神武器，当官的就可以利用当时的一些天灾或者什么怪异，来解说天意，给皇帝提意见。皇帝把这种意见看成是天意，认真听取，并且加以改正。董仲舒的这句话，就是说皇帝要听上天的，天又是按儒家思想塑造出来的，归根到底，皇帝要听儒家的。也就是说，要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全天下的思想。上自天子皇帝，下至百官万民，都要遵循儒家思想，都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里，“大一统”在思想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于这一点，董仲舒在对策中曾向汉武帝提出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守矣。”这是用“大一统”来讲“独尊儒术”问题的重要论述。独尊儒术以后，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自天子以至庶人论六艺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第一次出现“至圣”这个词。司马迁编《史记》，以天子为纪年，是最高级别的“本纪”，其次是诸侯，是第二等级的“世家”，第三等级是名人的“列传”，再下一级则是一类人的合传，如《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先秦百家争鸣，有许多派别的重要思想家，只有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也只有孔子的弟子作为群体列入“列传”，有《仲尼弟子列传》；作为学派的群体，包括历代儒家，收入《儒林列传》。这三项都是所有其他各家各派没有的待遇，只能说明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确实独尊儒术，否则就无法解释。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主干。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到独尊地位，董仲舒起了关键的作用。孔子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师”。

董仲舒这种思想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秦朝皇帝不信上天，为所欲为，



以天下奉一己，搅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秦始皇是无法无天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就要产生严重的腐败。这是普遍规律，也是东西方思想家的共识。因此，董仲舒认为需要给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加上精神枷锁，使他的个人欲望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董仲舒抬出天命论，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以改造，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

总之，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于皇帝；二是思想上的统一，统一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的唯心主义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具体内容主要有：

一、德治。董仲舒认为政治统治主要有两手：德与刑。他认为好的政治总是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他以天来讲这个道理。夏天，万物生长，是天重德的表现；冬天，是行刑政的表现，这时万物都已经躲藏起来了。这说明天把刑放在空处。他认为，因此实行好的政治也应该实施德治，刑要设而不用。给人民多一些恩惠，尽量避免使用刑罚。

二、调均。董仲舒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最容易导致天下大乱。“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贫穷的人当强盗，富裕的人为非作歹，这样社会怎么能安定？因此董仲舒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调均工

作，使富裕的人能够显示自己比别人高贵，但没有横暴乡里的资格；使贫穷的人年成好时一年都能吃饱饭，年成不好时也不至于饿死，上可以赡养老人，下可以抚养子女。他们能够这样生活下去，就不会去当强盗。

三、不与民争利。调均的政策是好的，要实行起来还比较困难。难在何处？难在当官的要与民争利。当官的有权有势，又有雄厚的资本，平民百姓自然争不过他们。董仲舒说，动物有四条腿的就没有翅膀，有翅膀的就只有两条腿。有上齿的就不长角（马），长角的就没有上齿（牛）。天生万物时，都不能兼给两方面的条件（兼予），人自然也不能得双份利益。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再利用其他手段获取利益。他举了公仪休的例子。公仪休是鲁国相，有一天，他吃到自己家种的葵菜，就把自己园中的菜都拔掉，认为自己拿了俸禄，还种菜，这是与菜农争利。他的夫人自己织布，他认为这是与女工争利，便把妻子休了。这就是所谓“拔葵出妻”。他引了孔子的话“不患贫而患不均”，来证明他的调均思想。调均的关键在于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当官的能够接受这种调均思想，怎么会有贪污受贿的事呢？怎么会有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这类肮脏的事情呢？

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官的要不与民争利，可以把董仲舒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强调道义，办一切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义。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功利。道义与功利的区别在于，道义是为人民的，功利是为自己。有些事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人民的，而出发点却是为了私利。例如有的人搞所谓纪念碑工程，不管人民是否迫切需要，他就下令大兴土木，建筑楼堂馆所，为自己树碑立传。董仲舒认为不要计较个人的功利，对于人民的功利，实际上就是道义，应该正确推行。因此，所谓不要功利，是后人的误解。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来说，重道义，是完全应该的。对于当官的人来说，重道义是责任，是使命，更加忽视不得。

五、董仲舒对于仁政曾经提到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塞并兼之路，限定



每个人所占的土地，不允许任何人占领过多的土地；二是盐铁经营权归还给人民，反对由政府来垄断经营；三是除去专杀奴婢的特权；四是减轻人民的负担，“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北宋的司马光说“吾爱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称董仲舒为“纯儒”，并把他的“正谊”“明道”两句话写入学规。清代有一大批学者研究并重新评价公羊学，同时也给董仲舒以充分的注意。清代著名公羊学者有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凌曙、戴望、陈立、王闿运、廖季平、康有为、苏舆、皮锡瑞、唐晏等。他们对董仲舒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对于他的天人感应说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理解，认为是当时时代的需要。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都是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

董仲舒一生的功业，可用一个对联来概括：

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
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一统，罢百家书。

本书以《春秋繁露义证》（苏舆撰，钟哲点校，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为底本，参以他本，汇校勘定。《春秋繁露》宋本已不多见，南宋楼钥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07）整理此书，始得八十二篇，后存于明《永乐大典》中。清乾隆年间，馆臣据此对勘，补1121字，删121字，改定1829字，是为“官本”；随后聚珍版（即活字版。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命馆臣择罕见之书校正刊行，由户部侍郎金简主管此事。金简以枣木制活字25万余，用以排印，力省功多。因活字之名不雅，赐名“聚珍版”）《春秋繁露》面世，为

诸家所关注。乾、嘉之际出现的《春秋繁露》两大校本——卢文弨校本和凌曙注本，均以聚珍本为主，所不同的是卢本参以明嘉靖蜀中本及明程荣、何允中两家本，凌本则参以明王道煜及张惠言读本。宣统元年（1909），苏州人苏舆（？—1914，字厚庵）兼取卢本和凌注，又得明天启本，撰成《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较完善的本子，故本书以之为底本，个别地方酌取他本。我两次参加《春秋繁露》校点工作，第一次是由我的导师钟肇鹏先生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我只校释其中两篇《竹林》《精华》。后来，我与李祥俊、李英华、鲍世斌、周兵、胡永中、章伟文以及山东的朋星同志一起参考此书，重新做了注译，出版时书名《春秋繁露》，由我与朋星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以《中国儒哲十大名著》一套书（另有套书主编）的名义出版。这次中华书局要出选本，从中选出原著内容大约三分之一，我重新做了大量校改，不仅从文字上进行校勘，还从思想上进行阐发，将我二十多年研究的结果融入注解与翻译，突出了思想性。别人有创见的注释，一般都标出注者的姓名。译文改动较大。

《春秋繁露》错简、文字脱误的现象较多。对于其中一些不能读解的，本书亦付之阙如，不敢妄加穿凿附会。限于水平，错漏难免，敬请指正！

周桂钿

2010年8月

目录

前言	1
楚庄王第一	1
玉杯第二	16
竹林第三	25
玉英第四	44
精华第五	49
王道第六	64
十指第十二	74
俞序第十七	78
立元神第十九	86
保位权第二十	92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	96
度制第二十七	100
仁义法第二十九	106
必仁且智第三十	117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122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	127
深察名号第三十五	132

五行对第三十八·····	144
五行之义第四十二·····	148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151
阴阳义第四十九·····	153
天道无二第五十一·····	156
基义第五十三·····	160
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163
同类相动第五十七·····	169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175
五行相胜第五十九·····	177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180
郊语第六十五·····	184
四祭第六十八·····	192
顺命第七十·····	194
郊事对第七十一·····	200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206
天地阴阳第八十一·····	230

∴ 楚庄王第一 ∴

【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里，《玉杯》《竹林》是本书篇名，没有《闻举》《蕃露》《清明》等篇名，汉代只称“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没有《春秋繁露》书名。后人集董子文成书，以《吕氏春秋》《晏子春秋》为例，署名《董子春秋》，而首篇名为《蕃露》，连起来变成：董子《春秋繁露》，这样，首篇便无篇名，抄写者就将首篇第一个词“楚庄王”作为篇名。而《蕃露》篇名从此消失。本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从称呼、遣词用字等入手，阐明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一是议论“新王必改制”的说法，认为“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①：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②，君子之所见也^③；襄、成、宣、文^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⑤，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⑥，所闻八十五年^⑦，所传闻九十六年^⑧。于所见，微其辞^⑨；于所闻，痛其祸^⑩；于传闻，杀其恩^⑪，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⑫。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⑬。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⑭。屈伸之志^⑮，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



远远，亲亲而疏疏也^⑮，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⑯。有知其厚厚而薄薄^⑰，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⑱。《诗》云^⑲：“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群匹。”此之谓也^⑳。然则^㉑，《春秋》义之大者也^㉒。得一端而博达之^㉓；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㉔；视其温辞^㉕，可以知其塞怨^㉖。是故于外，道而不显^㉗；于内，讳而不隐^㉘。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㉙，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㉚。义不讪上^㉛，智不危身^㉜。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㉝，则世愈近而言愈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㉟。

【注释】

①十二世：《春秋》所记鲁国的国君有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共十二代。三等：即把十二世分为三个阶段，指“见”（亲身经历），“闻”（听亲身经历者介绍情况），“传闻”（指经过两代以上传递的情况）三个时期。这一段话是通论《春秋》一书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应是《春秋繁露》第一篇《繁露》的篇首。而前几段则可能是《竹林》、《精华》等篇的内容。此说仅供参考，无确证之前，仍按原样为妥。

②哀：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定：鲁定公，姬宋，公元前509年—前495年在位。昭：鲁昭公，姬裯，公元前541年—前510年在位。

③君子：指《春秋》作者孔子。孔子亲身经历了哀公、定公、昭

公三代。哀公最后，是从后往前推的顺序。

④襄：鲁襄公，姬午，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在位。成：鲁成公，姬黑肱，公元前590年—前573年在位。宣：鲁宣公，姬倭，公元前608年—前591年在位。文：鲁文公，姬兴，公元前626—前609年在位。

⑤僖：鲁僖公，姬申，前659年—前627年在位。闵：鲁闵公，姬开，公元前661年—前660年在位。庄：鲁庄公，姬同，公元前693年—前662年在位。桓：鲁桓公，姬允，公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隐：鲁隐公，姬息姑，公元前722年—前712年在位。

⑥所见六十一年：即孔子所亲见的三世：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共61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昭公元年（前542）时，孔子已十岁。没有包含孔子十岁以前生活的鲁襄公时代。

⑦所闻八十五年：即孔子所闻的四世：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共85年。

⑧所传闻九十六年：即孔子所传闻的五世：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闵公2年，僖公33年，共96年。

⑨于所见，微其辞：微其辞，隐微之辞。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之世，没有用明显的言辞来指责批评，一是表示为尊者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迫害，明哲保身。当时国君有生杀之权，要小心谨慎对待，稍不留心，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⑩于所闻，痛其祸：所闻之世是父辈所经历的时代。这时代离自己比较近，对于国家的灾祸特别痛心。

⑪于传闻，杀其恩：杀，中断。所传闻之世，离自己比较远，恩情比较淡薄，就按自己的志向来写。由于感情因素减少，内容就比较客观理性。与以上“微其辞”（有话不敢直说），“痛其祸”（带着浓厚的感情）两种情况不同，就是平心静气地明白地写出自己的想法。

⑫逐季氏而言又雩(yú)，微其辞也：又雩，《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秋七